

3. 日本认为早一天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对于日本来说，有很多好处：可以解除部分人认为日本对满洲，将象日本对朝鲜那样的疑惑心，可以解除国际间对日本的误解和看法；可以决定了日本在满洲国内的领导权，获得满洲人对日本人的友好感情等等。

1932年秋，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日本以驻满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兼任日本首任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接着武藤信义和郑孝胥，代表日本和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从此，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成立，而满洲国也从此正正堂堂地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建国”前后的“满洲国”内幕

古海忠之

编者按：本文对中国人民抗日爱国行动进行了歪曲、污蔑，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但作者所述某些史料对于了解伪满洲国内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有关人事的种种问题

我们到任当时的满洲国，国家组织和行政机构刚刚建立，最高人事也才确定不久，新国家的建设工作尚未付诸实施。

满洲事变后，张学良部下的旧东北军主力部队被关东军击溃，向锦州方面败退，四处逃散的残兵败将化为匪徒，在各地猖獗，国内治安陷于全面混乱状态。与兵匪相呼应，在全国各地掀起暴动的还有满洲共产匪、土匪和宗教匪，其总数多达30

万人以上。于是，关东军不得不利用部分满洲人部队对上述匪团进行讨伐。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占据锦州的张学良部下的旧东北军，其次是黑龙江省主席兼黑龙江省军总指挥马占山。

关东军于昭和6年（1931年）12月末开始进攻锦州，锦州军不战而退。次年1月3日关东军进入锦州城，从而张学良政权被完全逐出满蒙地区。

马占山在满洲事变当时曾任黑河镇守使（步兵第三旅旅长），同年10月，被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省军总指挥。他在张学良的唆使下采取反日态度，曾同张海鹏军作战，后被关东军击败，逃往海伦。其后，经过关东军板垣参谋等人的再三说服，收回叛意，甚至出席了新国家的建国会议，并参与筹划，满洲国建国同时被任命为军政部长（大臣）兼黑龙江省省长。然而，他仍然同张学良保持联系。当国际联盟调查团来满调查时，他为“日本即将屈服让步”的谣言所惑，于4月3日（昭和7年）在黑河发表反满洲国政府的声明，从而背叛了满洲国。其后，在日满军的攻击下，辗转逃窜于北满各地。当我等到任时，他仍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

同年9月，黑龙江军旅长苏炳文，因相当于自己后辈的韩云阶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而不满，举起叛旗，被关东军击败后越过兴安岭逃往满洲里，无力抵抗关东军的进攻。正值此时，马占山也逃来满洲里，于是二人一同逃往苏联境内，投身苏军。

此外，热河省长汤玉麟，原定任命其为满洲国参议府副议长，但他在张学良的牵制下不明确表态，不参加满洲国的建国工作，始终态度暧昧。

在日籍高级官吏之间也出现一些人事纠纷。那就是总务长官驹井德三和笠木良明之间的争执。二者之间的冲突，乃是地方自治中心主义者和现代中央集权主义者之争。

笠木良明原定任命其为资政院院长。笠木的主张是以资政院作为执政的直属机关，在中央设训练所，任用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并在各县设参事官，直属资政院，从而确立地方自治体制，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建设道义国家的核心，该机关将由原自治指导部的大部分成员组成。

上述等于是双重政府的机构，就满洲国的性质和国务院的方针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最后，将资政院改为国务院资政局。但是，笠木始终不改初衷，以县参事官会议为中心向驹井施加压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驹井长官去奉天向关东军诉苦。

结果，关东军出面征求政府首脑的意见收拾残局，从全局出发决定支持驹井长官。6月中旬，召集参事官和资政局的有关人员到新京的“增屋”旅馆集会，由板垣征四郎宣布废除资政局，解散参事官会，又进行了一番人事调动，从而解决了这场纠纷。

但是，还有一个如何处理资政局训练所的问题。在此之前，笠木良明曾亲自回到日本国内招募和选拔资政院训练所学员，当时国内各大学的毕业生对满洲新天地的开发事业满怀热情，愿意积极献身，结果决定采用青年学生80余名，现在已集中在南岭训练所。

7月上旬，关东军的板垣参谋、片仓参谋和满洲国政府方面的驹井总务厅长官、阪谷总务厅次长、皆川秘书处长等集会协商，结果决定将资政局训练所改为大同学院，将来作为培养拥有高级官吏资格人才的训练所，使他们掌握满洲国的建国精神，了解满洲国的全而情况，从而作为满洲国的官吏，在日满共同意志和统一的指导精神下，为建设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家——满洲国而努力奋斗。

上述大同学院的设立在满洲国政界中产生了重大效果。经

过学院培训（6个月）的骨干官吏，不计名利，热心于地方行政，清廉而不拘泥小事，豁达开朗。这一切后来作为大同学院的校风而固定下来，成为向满洲国政界注入清新空气的源泉。

上述有关资政局的人事倾轧和纠纷，在我们到任前夕已获得全面解决。然而，日籍官吏的立场和相互关系尚未稳定，距离合作与协调还相去甚远。

接踵而来的是在满日最高首脑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矛盾。昭和7年10月上旬，由我主持制定的满洲国最初的年度总预算终于完成了，我们渴望能尽快地将总预算方案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再经参议府会议批准公布。但是国务院会议迟迟不见召开。经过了解，才得知原来是由于国务总理郑孝胥和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反目和冲突。

实际上，总务长官相当于国务总理的参谋长，协助国务总理推行国务行政，处于辅佐的地位。而驹井长官生性奔放不羁，倚仗对满洲的多年调查研究，极为自信，又深受关东军的信任，因此，一向不将国务总理放在眼中，往往将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国务总理。甚至驹井长官只要来到总务厅，郑总理便立即拂袖而去，决不同他见面。正由于上述情况，国务院会议的不能召开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外界还有传闻说，担任总理秘书的郑垂（郑孝胥的长子）曾劝说郑总理及早返回天津。总之，形势极为紧张。同时，各部总长（大臣）也无人对驹井长官持有好感。

上述事态如不设法及早解决，必将对建国伊始的满洲国、尤其是以民族协和为国家大计的新国家，造成致命的创伤。于是，关东局首脑不得不出面同政府首脑磋商，采取措施收拾残局。

结果决定总务长官驹井德三辞去长官职务，任参议府参议，同时，将总务长官的名称改为总务厅长，使人更易于理解其地位在总理之下；并扩大各部总长的权限，允许在各自的职权范

围内有权签署和决定各种法令及其他重大事项，贯彻各部总长（大臣）的意图。政府任命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为总务厅代理厅长，使事态平息下来。

本来，作为满洲国人事方面的根本原则，从另外的角度而言，出于政治上的深谋远虑，满洲国的政治和行政机关采取了满日高级官吏的双重组织。规定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大臣）由满洲人担任；总务长官（厅长）和各部的总务司长（次长）由日本人担任。各省及其他地方机关也都执行这一原则。至于有关科学技术的特殊机关又当别论。一般行政机关根据满洲国的性质均以当地出身有才能的人为最高首脑，以外来的日籍官吏为助手，担任副职。这一制度如果运用得当，应该说是稳妥的。关键在于日籍官吏的思想和对他民族的认识。驹井德三总务长官引起的这场纠纷，也涉及对民族协和的认识，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

对日籍官吏的统制措施

在以五族协和（后改为民族协和）的王道主义独立国家为标榜而建立起来的满洲国中，日本民族是其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被任用为官吏不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为了在尚未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体制的满洲，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富有经验和专业知识的日本人官吏的指导，无疑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在以民族协和为建国理想，又是在满洲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满洲国，无论就政治而言，或者就民族政策而言，都有必要予以慎重的考虑。为此，在满洲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助产”作用的关东军，当满洲国建立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便开始着手制定日本官吏的统制措施。

满洲国诞生后不久，关东军司令官同满洲国执政和国务总

理之间缔结了《本庄·溥仪协定》（日满秘密条约），其中的第四项规定：“关东军司令官拥有满洲国日本人官吏的推荐权（任免权）”，有关日本人官吏的事项，属关东军司令官专管。这并不说明关东军企图排除满洲国政府对日本人官吏的干涉，恰恰相反，这正是为了使不可靠、不适当的日本人进入满洲国，同时辞退不能胜任工作的日本官吏而采取的方针。

本庄关东军司令官对满洲国的日籍官吏问题尤其予以慎重的考虑，建国当时即确定并执行了日籍官吏仅限于极少量的必要的高级官吏，而且其对象仅限于侨居当地的日本人的方针。

因此，建国当时的日籍官吏，大部分是南满洲铁道会社及其相关会社的职员，官吏出身的只有外交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财政部的阪谷希一总务司长和源田松三税务司长，以及其他数名出身于关东州厅官吏的人，根本未曾想到要从日本各省招聘官吏。

关东军为了统制日籍官吏，规定了两项有关人事的限制和纪律，作为关东军的专管事项。其一是关于日满官吏的比例，即满洲国的一切机关都确定日籍官吏和满籍官吏的比例。其二是日满官吏的定位。即关于满洲国政府各机关科长以上职务，均明确规定了日籍和满籍官吏的定位。

关东军通过掌握日籍官吏的推荐权和上述有关满洲国官吏的日满比例和日满定位，从而对日籍官吏实行统制。

当满洲国的国家组织和行政机关建成，人事安排也基本就绪，即将着手实施新政时，作为满洲国至关紧要的当务之急就是整顿国内治安和确立财政金融体制。政府首先提出治安第一的原则作为重点国策。同时，确保税收，确定预算制度，稳定币值，则一国的建设是难以想象的。

财政部总务司长阪谷希一对此尤为重视，他确信及早发现

人才，确立财政金融体制是至关重要的，并积极向关东军提出建议，关东军也承认其重要性。结果，尽管有建国初期的既定方针，仍然要求大藏省向满洲国输送有专业知识的官吏。

根据上述要求，我等大藏省派遣团一行于7月中旬到达首都新京，当时的满洲国情况，已如上所述。我们立即到达被安排的工作岗位，决定以星野直树为首的7名骨干干部到财政部任职，只有松田令辅一人到总务厅主计处任处长。

对大藏省派遣官吏的上述安排，就其所承担的任务而言决非妥当。因为，我们对满洲国的行政机构几乎一无所知，原以为财政、金融、经济的主管机关就是财政部，而实际上，作为财政核心的预算、决算，以至国家资金的运用，其权限均不属于财政部，而是由总务厅的主计处负责。经过了解，发现总务厅是满洲国的一个独特机构，是为了处理直属于唯一的国务大臣，即国务总理的重要行政，诸如预算、决算、人事、秘书、庶务等而设立的。它是一个由总务长官领导直属国务总理的具有参谋性质的内部机构，是满洲国中央集权主义的核心，这种做法，一般都被称之为“总务厅中心主义”的行为。

根据上述制度，满洲国的财政一分为二，有关支出（预决算）及国家资金的运用事项，财政部没有任何权限。被委以财政、金融重任的大藏省派遣团领导人、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处于不能参与财政核心的地位，这不能不使我们大为困惑。

然而，幸耶，不幸耶？不久，主计处便爆发了问题。

本来，主计处以处长为首全部由来自满铁经理部的青年官吏组成，由于派去松田任处长，原来的主计处长被调往他处，但是以一般会计科科长宇山为首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团结。而且又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官吏，其中有的人相当粗暴，根本不把大藏官吏放在眼里，从一开始就摆出一副要压倒松田主计处长

的架势。

松田到任后不久，主计处全体人员在一个酒馆里举行新处长欢迎会，事件就爆发在这里。

当晚，松田一回到宿舍，就气急败坏地跑到我的房间，说：“喂，古海，你听着！主计处的这群家伙撸胳膊挽袖子，胡说八道，一拥而上，让我吃了苦头。要我在这帮小子的包围下去当处长，绝对办不到！”他泪流满面，愤慨已极。最后他说：“没办法，我要求回日本去！”

我暂且将松田安抚下，第二天一早，便向星野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建议应尽快向主计处派一个能维护松田的人。星野也同意我的意见，并立即物色人选。问题是谁也不愿到那种有风险的地方去。星野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说服我，“看来只有你去了，拜托你！”这样，我终于去了主计处。

我辞去了财政部的文书科长职务，来到主计处担任当时正缺额的总务科科长和特别会计科科长。我等于充当了松田处长的啦啦队，去讨伐主计处猛将的角色。其实，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经过多方工作之后，这些人逐渐开始接近我，从此，主计处内再也没有发生任何风浪。于是，我便在主计处着手制定满洲国最初的年度总预算。不久，松田处长因患伤寒住进满铁医院，我立即被任命为代理主计处长，得以顺利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应该说是幸运的。